

# 從改革開放到未來世界

陳方正

將近四十年過去，當日經過猶歷歷在目。我第一趟（大概也是最後一趟）坐在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吃驚地看着台上一度叱咤風雲的老將軍大聲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那天晚上，在喜氣洋溢的國宴中碰見幾個老朋友，大家興奮莫名，幾乎喝醉了茅台，然後逐漸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時刻。就這樣，中國走進了一個和前此三十年，甚至前此六七十年都完全不一樣，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內部鬥爭和動亂結束了，政治口號和教條慢慢減少以至消失，中國終於敞開大門，放下恐懼，面對似乎還那麼陌生的世界，然後彎下腰來，為追回無數代人錯失的時光而咬緊牙關，從頭學習，付出無窮辛勞和血汗代價。一百四十年來，中國第一趟真正站穩腳跟，看清大勢，知道應該朝哪個方向走，也累積了足夠力量和決心，去克服路上障礙，甚至攀越攔路峭壁。

## 一 當日與今天

回顧這四十年來路，不可謂不艱難崎嶇，也不可謂不險阻重重，甚至血淚斑斑。二十九年前的那場搗心搗肺、肝腸撕裂的大悲劇無人能料，無人願見，也永遠難忘。它以那麼慘痛的方式結束，是我們這個龐大國度在改革開放路上所必然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嗎？還是頭腦更清晰的學生，或者更睿智、更有遠見的當權者可以避免的？那將成為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號。唯一可以慶幸的是，國家沒有崩潰分裂，改革開放也沒有中斷，傷痛過後，終於還是沿着同樣道路繼續走下去，一直走到今天。

而今天，恐怕是當年提出改革開放口號之初，甚至十七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夕，都還夢想不到的。世紀之交，劍橋大學的諾蘭(Peter Nolan)教授以「中國大型企業還將何以立足」為題發表演講，判斷中國加入世貿之後許多大型國企必將倒閉，由是導致政治動亂<sup>①</sup>。時光荏苒，又將近

二十年過去，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財富》(Fortune)雜誌2017年公布的「世界500強」(Global 500)名單中，中國公司在前十名中佔三位，前百名中佔十八位，整體佔23%，和中國人口在全球份額相若。不但如此，如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最近發表的國家安全策略文件宣示，現在深刻感到全球經濟競爭威脅的並不是中國，倒是作為西方經濟和軍事火車頭的美國。他上任後的連串外交、貿易、移民和經濟措施更表明，歷來以開放、包容、多元文化為號召的花旗國度，現在要一步步關上大門。反過來，我們這千百年來安土重遷的古老大國，卻鄭而重之一再宣稱，要通過「一帶一路」來奔向全球，擁抱全球，永遠採取開放政策。這樣的對比委實太鮮明，太令人吃驚了。中國這個大膽構思自然不乏謀略和現實考慮，但也要看到，它反映了新眼光，新思維，乃至氣度和信心。

這氣度和信心是以實力為基礎的。中國領導人在去年10月閉幕的中共十九大上宣稱，要在十五年內達到小康社會，三十年內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是有根據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中國、美國、美歐日(合計)等三個經濟體在201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分別為11.2、18.6和39.9萬億美元；至於它們的年增長率預測則分別為6.8%、2.3%和2至3%之間。也就是說，中國的年增長率比其他三個經濟體高出4%左右。以較保守的3%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在大約八年之後超越美國，二十年之後超越美歐日三者總和——實際上也就是超過目前整個發達世界。當然，隨着經濟成長，發展速度將會放緩，增長率的差別也將隨而縮小。但中國人均GDP(約8,000美元)現在尚遠低於上述發達國家，大約只是它們的六分之一左右，所以還有空間在相當長時間內以同樣優勢增長。說到底，中國的人口高於上述三個經濟體總和，所以在發展程度相若的時候，經濟規模自然要超過它們。換而言之，中國正在以努力和堅韌逐步返回天下中心位置——昔日的「天下」，現在包括整個地球了！

## 二 憤懣與疑惑

面對似乎一片光明的美好前景，中國知識份子卻顯得異常憤懣和沉默，而那是很有理由的。憤懣，是由於所見到的大量不公義現象。立刻來到心頭的，自然就是2017年底北京大興區那場奪命火災，事後國家和市政府沒有為此道歉，沒有為災民送來安慰、撫恤、重建，反而雷厲風行強行拆遷、驅趕北京周邊地區的「低端人口」。這並不是孤立事件，它令人想起廣東陸豐烏坎村的土地維權鬥爭和其他無數由土地使用權產生的同類糾紛、抗爭。而且，除此之外，還有無數令人痛心的不同類型事件，像二十多年前爆發的河南上蔡艾滋病村事件，那關係千百人性命；十年前的三鹿集團毒奶粉事件，那嚴重影響大量嬰兒健康；兩年前的北京雷洋事件，那是執法人員橫行無忌的典型。諸如此類，真可謂不勝枚舉。統而言之，它們都可以歸結為法制不健

全，專業體系疏漏低劣，從而造成行政嚴重失當。也就是說，公職人員和國家機器都遠遠追不上急速改變的時代要求。

對於這些問題的根源，中央政府不可能不明白，也不可能不願意或者不盡力糾正——但處理方式和能力卻十分令人失望。而最令知識份子感到憤懣和鬱悶的其實是，在當前體制和政策下，無論這些事件本身，抑或它們的責任承擔，更不要說糾正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都不允許公開討論，無論在課室、演講廳、報章雜誌、書籍或者電子媒體上都是如此，真所謂「萬馬齊瘖究可哀」。知識份子被迫緘默，因此只有回到專業，發揮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的功能。作為專家學者，他們倒是國家所需要的，只要看看近二十年來政府用了多大氣力擴展高等教育，投放了多少資源到教育和科技研究，就很清楚了。然而，知識份子倘若要「議政」，那就只有進入政協或者人大，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之內發言了。

這個體制和西方國家的體制，即所謂「自由民主秩序」(liberal democratic order)是很不一樣的。後者的言論尺度寬鬆得多，它的議員和執政者是通過參選門檻很低的競爭性選舉產生，而行政、立法、司法等三個部門不相統屬，互相監督牽制。這個體制並非憑空創造出來，它從十七世紀末出現，然後經過兩三個世紀之久的探索、修訂和發展，方才逐漸定型，所以是一個飽經考驗的成熟體制。西方學者向來認為，他們國家之所以興旺，就是由於實行了這個體制，任何國家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都必然會趨向這個體制，實行它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理念。日本和南韓應該算是在美國扶持下，走上這條道路的成功典型。中國知識份子從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之以至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也同樣對之心往神馳，希望能夠把它移植到中國來。但他們都失敗了，新中國所選擇的，是艱苦曲折難於上青天的另一條道路。不料，到了1970年代山窮水盡之際，它一拐彎卻柳暗花明，踏上了改革開放的大道，一直走到今天。問題是：這條路今後還能夠一直走下去，以至三十年後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嗎？也就是說，西方體制其實並沒有獨特性，中國另闢蹊徑也同樣能夠變為先進發達，站在世界前列嗎？這問題在四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恐怕都不會有人認為需要討論，但到今天，則是人人都不能不關心的了。

### 三 改革開放的回顧

上述大問題千頭萬緒，但仍然必須從改革開放的歷史說起。在1980年代，所謂「改革」，就是向西方學習，來重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所謂「開放」，就是引進西方事物、方法、人才，乃至思想。它起初十分成功，後來卻引起了巨大政治震盪，導致1989年那場大悲劇，因而出現重大轉變，即經濟上依然開放革新，政治上則變得審慎保守，以維持穩定為主。其後二三十年間，中國所奉行的便是這麼一套雙軌制度，也就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它的基本理念是以黨為領導核心，以全國而非個人為優先，國家的長遠目標和利益分配等重大問題，統統由權力高度集中的黨來決定。它的優點是能夠為國家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環境，使它得以專心致志於實質建設，發展經濟、教育、醫療、科技、軍事、產業、交通、城市，而不必耗費精力於統一意見、平息紛爭。至於部分人在急速發展中要蒙受多少冤屈不平，承擔多大壓力，皆在所不計。這是個精英統治制度，和十八世紀德奧等國的「開明專制」不無相似，但規模放大數十倍，明君角色則改由組織嚴密的龐大政黨來擔當。在它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中，處於頂尖的少數領導人是由內部推舉產生，十年一任。

這個體制的效率顯而易見：高速經濟增長使它在國際上獲得尊重，在大部分國民心目中也贏得認同，甚至擁護。然而，它的缺陷也很明顯：弱勢群體缺乏有力代言人，因此飽受壓榨，更要為當權者行政失當付出沉重代價，所謂不公義現象，根源即在於此。此外，目前還在進行的反貪腐運動固然令人額手稱慶，但民眾為所牽涉官員級別之高、數目之多、金額之巨而咋舌之餘，亦不免奇怪，貪腐範圍到底有多廣多深？被判刑者即使罪有應得，又有多少主要是受政治牽連所致？詳細案情之絕少披露，自然更加深了這種種疑惑。但最令人忐忑的則是，1960、70年代那些驚心動魄場面雖然已成歷史陳迹，過去三屆黨政領導人也順利交接，但六年前卻再度盛傳政變驚魂。那也就是說，最高領導權的繼承制度仍然不穩定，仍然有待制度化。這些，當然都不是在一個現代化強國所應該看見的現象。換而言之，體制缺陷和行政失當是不能夠完全以經濟發展成果來彌補的。

所以，即使中國目前這條以黨治國，以民主集中制治黨的道路能夠一直走下去，它的具體制度也仍然需要大事改革。事實上，無論何種制度，無論在中國或者西方，都不可能一成不變，都必須因應實際狀況和需要而不斷改進，否則就無從適應當前瞬息萬變的世界，繼續發揮應有功能。而改進之道，無疑也必須參考西方先進經驗。在1980年代，中國放下了對西方經濟體制的恐懼，現在是放下對西方理念和體制的恐懼的時候了。但這和承襲或者移植西方體制卻絕不一樣，因為歷史不相同，國家規模也不一樣：歐洲一國，只不過相當於中國一省甚至一市而已。所以英國體制不能夠移植於美國，歐洲各國體制也不能夠擴充到歐盟，它們都必須根據歷史經驗和現狀需要而發展出適合自己的獨特體制。更何況，西方民主體制在當前已經遇到強力挑戰，甚至本身都出現了嚴重問題。

#### 四 西方體制及其面對的挑戰

西方體制的核心是民主和言論自由，前者賦予政府合法性，後者提供宣洩民怨、反饋民意於政府的有效渠道。這兩者作為基本原則固然沒有爭議，

應當如何具體實行卻並無普世準則。西方的理想可稱為「開放式民主」，它的特徵是極其寬鬆的言論自由尺度，參選門檻極低的競爭性、對抗性選舉，以及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它以「政府是全民共有、共治、共享」為最高理念，那自然能夠風靡群眾；危險則在於其開放性，那往往導致政策紛爭和搖擺不定，甚至政局不穩。那麼，為何多年來它又能夠行之有效，令西方國家成為舉世最先進呢？這其中有兩個關鍵。首先，經過長期醞釀，這些國家的民眾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已經建立牢固的基本共識，因此政黨輪替無關大局，不會導致根本變動——德國納粹通過普選而上台，其後顛覆了威瑪共和體制，那正好從反面說明這個道理。其次，直至上世紀末為止，西方在科技和商業上遙遙領先世界。在寬裕的順境中，國民共識乃得維持不變。可是時移世易，在本世紀全球化浪潮高漲，西方在經濟上的優勢被大幅侵蝕，甚至有消失之虞，於是它們的民主體制就遭到挑戰和考驗了。

我們且看新加坡吧。它的政府雖然由普選產生，卻以一黨獨大，長期執政，權力不受挑戰，言論尺度嚴苛為特徵，那顯然和西方的開放式民主大不相同。然而，它的廉潔、效率和發展程度之高，卻令絕大部分高度發達國家瞠乎其後，無怪乎西方對它愛恨交加了。反過來看實行開放式民主多年的中南美洲國家，它們大部分一直為政府貪污無能、效率低下所困擾，經濟更受盡美國宰制剝削而無從發展，直至近年方才因為左翼政府的出現而略有起色。但最令人吃驚的，則是作為西方龍頭的美國。它以健全法制和周密成文憲法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已經實行兩個多世紀，最近卻顯然出了大問題，充分暴露競爭性政治發展到極致的禍害。在對立意識形態驅動下，兩大政黨為了勝選，金錢、訴訟、抹黑、揭發隱私、勾結外力、改劃選區(gerrymandering)等手段皆無所不用其極，選舉直淪為無硝煙全面內戰，而由是產生的總統素質如何，也是有目共睹，騰笑天下。在大西洋彼岸，民主傳統更深厚的英國也同樣因為脫歐問題而舉棋不定，進退維谷，陷入巨大政治危機而不能自拔。英美兩國的困局絕非偶然：在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強力競爭下，它們逐漸失去經濟霸權，國內由是出現因教育程度差異而產生的兩極分化，這在美國更連帶勾起了根深蒂固、長期潛伏的種族問題，遂導致基本共識崩潰，政壇陷入紛擾與混亂。換而言之，在面對嚴峻挑戰之際，開放式民主是否仍然為最適當體制，實不能無疑。

## 五 未來改革當走向何方？

我們討論西方民主目前面對的困境，並非意味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已經完善，可以適合中國的長遠需要，更不是認為新加坡的城邦體制可以移用於中國。正相反，隨着經濟迅速增長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顯然亟須重新推

動政治改革，以建立更健全穩固的體制。但同樣顯然的是，改革到底應該走向何方絕非簡單問題。1990年代俄國未經深思熟慮的大改革帶來慘痛後果，正是前車之鑒。況且，經濟改革可以立竿見影，為大多數人帶來可見利益，所以推行容易。政治改革則無可避免要觸動在位者權力，而且成效難以在短期內彰顯，所以扞格難行，它只能夠從淺近、實際之處開始，緩慢推進。

其實，西方政治運作暢順有序，並不完全在其內涵，很大部分是在形式，即尊重「遊戲規則」。這也就是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在努力改善的法治和法制建設。前面提到的種種不公現象，也莫不與法制不健全密切相關，所以在今後，它無疑還將是最重要的工作。不過，中國的法律傳統委實太粗疏薄弱了——歷史上，它完全偏重於刑法，而且絕少涉及法理基礎。西方法律傳統則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紀的《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和十三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淵源更遠至三千七百年前即夏商之際的《漢謨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它之所以那麼細密精微是長期發展的結果，並非朝夕可至。所以，中國在這方面的道路仍自漫長。

其次，中國遲早要認真面對言論自由的問題，那長久以來被視為高度敏感，一部新聞法規遲遲不能面世就道盡了其中艱難。在西方國家，言論自由被奉為主臬，好像是神聖不可觸動更易。其實，它們和中國一樣，也面對如何處理有害或者尷尬言論的問題。事實上，被認為可能顛覆社會穩定或者共同價值的言論，在西方也同樣是不受保障的。例如，德國嚴禁宣傳納粹或者反猶太主張，法國和奧地利禁止婦女穿戴蒙面服飾以宣示其伊斯蘭身份，英國和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立法禁止與種族、宗教、性傾向等有關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格於憲法規定，美國沒有這類禁令，但卻能夠施加無形社會壓力來封殺「反社會」言論。麻省理工學院著名教授察姆斯基(*Noam Chomsky*)大力抨擊建制和資本主義的講話、書籍大部分被迫在加拿大出版，在美國幾於絕跡，就是個顯著例子。因此，言論自由並不是非黑即白的絕對觀念，它的尺度可以有相當彈性——當然，也不能夠過份延伸，例如被用作保護非法行為或者行政失當的藉口。無論如何，通過完善法規和管理體制，中國在這方面其實還有極大改進空間，關鍵只在於如何制訂自洽、完整、合理、可行的法規，和建立切實執行的機制而已。

最後，政治體制的改革無疑是最複雜，也最扣人心弦的問題。在今後二三十年間，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以及國民在收入水平、教育素質、國際化程度等各方面的急速提高，國人精神面貌與基本追求必將發生重大變化。在這嶄新形勢下，中國政治體制隨而發生相應蛻變自不可避免。但它到底會朝甚麼方向發展呢？共同願望自然是，它變得更穩定、有序、合理，使民主集中制更趨完善。那也就是說，各級黨政代議機構如黨代會、中委會、人大、政協等的開放、包容、公開、透明程度能夠大幅度增加，以使得它們充分發揮本身的代表性、主動性和積極作用。

否則，可以預見，目前的體制將會在三方面遭遇嚴峻挑戰。首先，是無法繼續為國民提供一個寬鬆、自由、活躍的社會環境，以充分激發、釋放他們的創新能力，由是令中國在國際競爭上迅速失去優勢。其次，是在全球融合的大潮流中，無法通過文化魅力和體制示範而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領導地位。最後，則是國內爆發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從而導致精英份子大量流失，乃至廣泛社會動盪甚至停滯。統而言之，沒有大幅度政治改革，中國目前顯示的巨大活力、動力將不可能繼續維持，日本在過去二十年的所謂「迷失」或者英美目前的困局，也同樣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在上述挑戰的無形但巨大壓力下，目前體制的緩慢和持續蛻變將不可避免。

然而，弔詭的是，即使如此，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結構和原則卻未必會有根本改變。這個看法是基於我們對未來世界本質的判斷，它自必令許多人深感失望，但不是沒有根據的。

## 六 展望未來世界

談到未來世界，我們總會覺得它非常遙遠，只會在科幻小說中出現。但在今天，所謂未來，其實已經來到眼前。我們只要想想鋪天蓋地、籠罩也連結每一個人心靈的互聯網和手機，或者人工智能在即時傳譯、辨識面貌、駕駛汽車、下棋，乃至通過公開考試等各種不可思議能力，就再不會有任何疑惑了。中國希望在短短三十年後成為現代化強國，那同樣會是人工智能趕上人類思維，世界掀起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其時機器人會承擔世界上大部分工作，一般人不必再營營役役，而可以在「全民入息」制度的保障下優遊度日；世界人口將減少，全球暖化和資源枯竭等問題因而得到緩解；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加劇和帶動，國家界限將逐漸淡化，全人類逐步融為一體的大趨勢將無可阻擋，不過其全面實現則恐怕要等到二十二世紀了，所以今後數百年將是個漫長的過渡時期<sup>②</sup>。事實上，全球融合的過程在上世紀已經由世貿組織的出現而啟動，它今後不但將加速，而且主導權的爭奪勢將日趨激烈熾熱。像美國倡議的《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中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一帶一路」計劃，就都是其表現。可以預見，此後它還將在經濟結構、金融體制、基礎設施、服務行業、醫藥食物標準、交通運輸，乃至安全保障體系等各方面繼續擴展和深化。

在這場競賽中，集中而穩定的領導權會帶來巨大優勢，因為長遠目標不會由於追求逸樂而鬆懈，也不會因為艱苦或者挫折而動搖。過去一年間，民粹主義在英美爆發，逼使它們從全球化進程退卻，那就是因為它們的民眾在巨大競爭壓力下，不再接受全球化觀念之故。但西方有識之士絕不可能放棄這場競賽，也不可能忽視此中關鍵。所以它們本身就很可能以某種方式(例如

各黨派長期聯合執政)轉向更集中和穩定的體制，也就是反而趨向中國模式。這像是天方夜譚，但我們只要想到，富裕如英美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這問題上是如何舉步維艱(英國擴建希思羅機場和美國建造東西海岸的長程高速鐵路曠日持久，無法展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它們的困境了。

另一方面，當世界充分融合之後，未來世界又將變得高度「非政治化」。也就是說，它的治理將成為主要由專家負責的行政問題，而不復是由政黨訴諸民意來決定的政治問題。這有好幾個不同原因。首先，在高度科技化的社會，重要問題已經變得太專門和複雜，不再是一般人所關切或者能夠充分理解，更不是數千百萬人所能夠達成共識。在目前，全球暖化、「減排」和再生能源就是這樣一個環環相扣的複雜問題，而本屆美國政府在此問題上的倒行逆施，更清楚顯示了這類問題政治化之後所將帶來的嚴重後果。其次，在規模龐大的全球體制中，主要官員或者民意代表無論經由何種制度產生，他們與個別人民之間的距離都將變得太遙遠，因而不可能有頻繁和密切互動。現在歐洲一般人民視遠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為不諳民情、不受約束的官僚，正就反映了這個趨勢。但最重要的則是，在人工智能全面滲透所有行業的衝擊下，未來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各種服務的提供再沒有基本限制，所以它們的分配蛻變為社會管理策略，而不再是敏感政治問題。在目前，高度發達國家、城市如挪威、新加坡、澳門等，其體制實際上已經在朝這種形態演變了。

統而言之，無論在全球融合過渡時期的主導權競爭之中，抑或在充分融合之後的未來世界中，政治體制一方面會趨向於公正合理，另一方面卻將變得高度層級化，權力也將更為集中。基本上這是由人口規模、科技世界本質和在過渡時期劇烈競爭的需要等三者所決定的。

## 七 對未來的反思

以上只不過是我們對於未來的管窺蠡測而已。但在人類融合的大趨勢之下，全球治理體制並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它是由未來世界的本質所決定——高科技、全球化、人類社會融合這三者是互為因果，互相推動，密不可分的。因此，它也是人類文明演進的自然結果。當然，對此自不免會有許多激烈反應。例如，必然有人要反問：倘若在未來世界人類會被無形的專家團體統治，從而失去自由，失去主宰自己命運的力量，那麼為何還要選擇現代化、全球化？科技到底是誰的科技？它的目的不就是為個人的方便和福祉嗎？為何人類那麼愚蠢，容許它反過來掌握我們的命運，毀滅我們的自由？

這樣的憤慨非常自然，卻忽視了兩個基本問題。首先，科技的發展本來誠然是為了一般人的便利，但它卻又必然改變、顛覆社會原有結構。其次，它發展起來之後，就猶如從瓶子裏面釋放出來的巨靈，是不可遏制，也無法

再隨主觀意願來指揮的。莊子在二千三百年前反對用機械裝置即桔槔來舀水，甘地在上世紀也反對用紡織機，而提倡用人工紡紗織布。他們都深深意識到機械對傳統的巨大顛覆性。可是，和十九世紀搗毀紡織機的英國工人一樣，他們都徹底失敗了。科技發展和隨之而來的全球融合是人類進化的一部分，它不是人類本身所能夠阻止或者控制的<sup>③</sup>。

即使如此，這個對未來世界治理結構的看法是否可靠呢？它必然是高度集權和層級化的嗎？當然，那純粹是我們的猜測而已。但今日全球經濟命脈已經完全受數百家巨無霸型跨國公司主宰了，我們正可以由之得到重要啟示。它們排在前列的每一家就年營業額而言，都已經可比人口千百萬的中等或者富裕國家的GDP，因此也有能力與這些國家（或美國各州）分庭抗禮，談判其運作的條件。但它們的內部結構卻無一例外，都採取徹底的層級制和高度中央集權<sup>④</sup>。在人類社會徹底融合之後，國際間商業發展界限泯滅，經濟力量集中於少數巨無霸型公司和精英階層的趨勢自然更將加劇。經濟如是，其他領域亦不可能例外。

說到底，人的自由平等理念是建立在下列基本假定之上：每個人都是獨立，具有各自人生目標、愛好、思想、感情的個體，這「主體性」(subjectivity)至高無上，不應在任何情況下受到侵犯、損害。然而，現代經濟體系正就與此背道而馳，它正是要通過作為「隱秘游說者」(the hidden persuader)的大眾傳媒來影響和改變每一個人的思想、感情、愛好——甚至生存意義，以將所有人納入一部巨大經濟機器之中，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經濟效能。人既然已經全情投入和擁抱這個以大眾消費社會(mass consumer society)理念為核心的體系，那麼個人「主體性」其實早就已經淪為幻象。在人類社會全部融合的未來，很難想像上述趨勢之變本加厲如何可以避免。當然，屆時一般人很可能仍然得以生活在美妙的新幻象之中——文明的魔力和魅力，不正就在於它創造和維持「美妙新世界」的巨大能力嗎？

### 註釋

① 諾蘭(Peter Nolan)：〈中國大型企業還將何以立足〉，《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6月號，頁5-19。

② 參見陳方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論人工智能與未來世界〉，《科學》(上海)，2017年第5期，頁17-23。

③ 有關論證在此無法展開，詳見上引論文。

④ 在《財富》「世界500強」表列中蘋果(Apple)排第九位，它的年營業額處於葡萄牙和芬蘭的GDP之間；豐田(Toyota)排第五位，營業額處於愛爾蘭和智利之間。全部500家公司營業額之和佔了全球總產值的37%。